

朱漢之

文集

朱 谦 之 文 集

第 十 卷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朱谦之文集（共十卷）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3725592 7811283

传真：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350012）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93 字数 7913 千 插页 47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7-5334-3522-2/C·3 定价：1200.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电话：0591-3726019）调换。

《禅学思想史》和六十年来中日禅宗的研究

——代 序

杨曾文

中国著名学者朱谦之教授在晚年把日本佛教学者忽滑谷快天的《禅学思想史》（中国部分）译成了中文，希望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但直到去世，未能如愿。此后因种种缘故，此稿在书堆中又沉睡多年，多亏黄心川教授留心此事，把它找出，又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的好意，把它出版。这确实是学术界的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忽滑谷快天（1867～1934）是日本近代早期著名佛教学者之一。东京人，自幼受曹洞宗的传统教育。一八八四年入东京的曹洞宗大学（现名驹泽大学），专攻佛学，尤致力于曹洞宗学，毕业后从善长寺住持忽滑谷亮童受法。一八九一年入庆应义塾大学，二年后毕业。此后在曹洞宗的高等中学、曹洞宗大学及庆应义塾大学等处任教，并从事佛教研究，发表《禅学新论》等。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开始，奉曹洞宗当局之命赴欧、美考察宗教和学术二年。一九一九年担任曹洞宗大学教头，后任此校校长。一九二五年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曹洞宗大学升格改名为驹泽大学，任校长。著作很多，有《禅学批判论》、《禅学讲话》、《禅之妙味》、《参禅道话》、《达磨和阳明》、《清新禅话》、《和汉名士参禅集》、《乐天生活之妙味》、《禅家龟鉴讲话》、《养气炼心之实验》、《禅的理想和新人生的曙光》、《信仰和民力》、《禅学提纲》、《禅的信仰》、《普劝坐禅仪讲话》、《禅学思想史》上下二卷、《朝鲜禅教史》等。其中的《禅学思想史》上下两卷分别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年出版，实际是忽滑谷快天的博士学位论文。

忽滑谷快天的《禅学思想史》是日本禅学和禅宗研究领域的划时期的代表作。此书主要根据汉译佛教经典和中国佛教著述资料，考察论述了印度禅学的形成和禅学内容；作为佛教组成部分之一的禅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从南北朝至清初的禅宗逐渐形成、盛行、衰落的演变历史。本书结构严整，条理清晰，在论证中利用了丰富的传统佛教和禅宗的资料。在当时，本书被誉为禅学思想史研究的有力“杰作”。综观全书，有如下特色：

(一) 全书从论述印度禅学入手，进而论述禅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演变，再考察禅宗形成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流传情况和禅法特点。全书原有两大部分：“印度部”和“中国部”。“印度部”的篇幅仅占全书的百分之十一，论述“外道禅”（婆罗门教和数论的瑜伽禅法）和“小乘禅”，旨在说明佛教的禅法源于在《奥义书》等文献中所表述的“外道”禅，但有发展。这一部分的内容，朱谦之教授没有译，仅译了“中国部”，故改题《中国禅学思想史》。

(二) 全书以“中国部”为重点，按禅宗的发展阶段，分为六编：第一编是“准备时代”，写从东汉末安世高翻译小乘禅经到南北朝梁武帝时菩提达磨（本书不用“摩”字）来华，不仅介绍翻译禅经的情况，也介绍这一时期重要佛经的翻译。第二编是“纯禅时代”，特指从达磨来华至禅宗六祖慧能为止的禅宗酝酿和形成的时期。所谓“纯禅”是指达磨禅或祖师禅，谓信奉大乘教理，用普通佛教用语传法，不重棒喝机用等。第三编是“禅机的时代”，讲从慧能去世至五代之末禅宗分成五家的禅宗史，谓各家禅法重禅机，棒喝并用，宗风大变。第四编是“禅道烂熟的时代”（前期），讲北宋的禅宗。第五编是“禅道烂熟的时代”（后期），讲南宋禅宗。“烂熟”是指如水果熟透了那种情况，已发展到极端，而物极必反。认为这两个时期由于教禅混淆、禅净合流，使禅道发展到烂熟，已孕育着危机。第六编是“禅道变衰时代”，讲元代至清乾隆时期的禅宗。认为儒释的融合，王阳明学说的兴起，念佛禅的盛行……使禅道名存实亡。

(三) 本书为了论述清楚，采用三段表述方法：每编前有“概说”，提示每一个禅宗发展阶段的要点；每一章前有“略论”，讲各章中心内容和重要结论；各节为详述。有此安排，读者可根据需要选读不同部分。

(四) 虽为禅学史专著，但所涉及的方面十分广博。值得注意的是，各篇章对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都有简明的交代；对各代帝王士大夫的奉佛、参禅的事迹，也多有介绍。宋明理学的形成，受禅宗的影响很大，本书对此也有论述。因此本书不仅对研究佛教，而且对研究历史、文化、哲学也有参考价值。

(五) 本书各节篇幅不长，一般是提出论点后，再把所据的资料引上。这样做的优点是简明扼要，缺点是没有展用必要的分析说明；在不少地方，对一些可以作出不同解释的引文，没有进行诠释，做出明确结论。引证原文很多，但某些地方遗漏注明出处。

本书是日本近代以来第一部禅学思想史，在结构、体例以及论述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不足之处是可以理解的。从本书发表至今已过了六十多年，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佛教研究与其它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一样，已取得巨大的进展。从现在来看，本书在资料的运用上存在着极大的时代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一) 没有看到敦煌遗书中的大量早期禅宗文献和禅宗史书，其中主要的

有敦煌本《六祖坛经》、神会《坛语》、《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神会录》）、《南宗定是非论》、《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等；

（二）没有充分利用保存在《全唐文》、《金石萃编》、各种文集等图书中的碑文、传记和其它实证资料；

（三）由于在论述禅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要运用唐中期兴起的禅宗南宗的史料，所以对禅宗的早期历史和禅宗整体不能做出全面客观的论证。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日本禅宗研究的旧时期的结束。此后由于敦煌禅籍等新资料的发现和使用，其它有关学科的进步，使禅宗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禅宗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绩。尽管如此，《禅学思想史》在今天对我们从事禅学和中国禅宗的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不仅它所提供的资料和线索对我们仍然有用，而且一些论点仍能给我们深入研究以启发。

在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出版以后的六十多年中，日本的禅学和禅宗研究确实取得飞跃的进步，其重要原动力是大量敦煌禅籍的发现和利用。由于敦煌禅籍和其它新资料的发现与使用，日本学者对一向被忽视的早期禅宗的文献和历史；对禅宗北宗及南北宗的对立和斗争；对《六祖坛经》等南宗重要典籍的研究与整理；对禅宗历史和禅宗理论的考察研究，都取得众多成绩。在此仅作概要介绍。

（一）《六祖坛经》新本的发现和研究

《六祖坛经》是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638～713）说法和生平的集记。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说，《坛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它最初形成之后，历代有人对它改编补充，产生过不同的本子。但在明代《大藏经》把元代宗宝改编本《坛经》收编进去以后，其它诸本《坛经》逐渐湮灭无闻。日本学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及其以后，陆续发现敦煌本《坛经》及源于宋本的兴圣寺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以及元代德异本《坛经》等，进行了不同程度地研究。

敦煌本《坛经》（写本，斯坦因 5475）。原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矢吹庆辉（1879～1939）一九二六年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中发现，校勘后在一九二八年把它收入《大正藏》第四十八卷之中。铃木大拙（1870～1966）对此进一步研究，一九三四年出版了他校订的《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全书分五十七节，并撰文解说。此校本成为以后最流行的敦煌本《坛经》本子。此后宇井伯寿、柳田圣山、中川孝等人，也都对敦煌本《坛经》进行校勘或译成日文，并有大量研究敦煌本的论文。

敦煌本是现存最古的《坛经》本子。此本《坛经》不分节，后面师弟机缘（师徒关系）部分篇幅较少，谓此书是法海——道滂——悟真三代相承，当形成于九世纪中叶之前。

源于宋惠昕改编本《坛经》的兴圣寺本、大乘寺本等。在敦煌本《坛经》发现以后，启发日本学者搜寻古本《坛经》，后在京都兴圣寺发现宋惠昕本《坛经》。此本内分十二门，有小标题，版心有《千字文》中的“军”字，当是翻刻宋版本大藏经的本子，明显上承敦煌本，内载此书传承世系是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圆会五代。卷首有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兴圣寺僧了然从别本抄来的宋惠昕的序和宋晁子健的刊记。据此，惠昕于太岁丁卯（胡适考证为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九六七年），将一部“文繁”的《坛经》改成两卷十一门。此本是晁子健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所刻，底本是他七世祖文元公晁迥所读的《坛经》。铃木大拙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了由他校订的兴圣寺《坛经》，并著文介绍。

属于惠昕本《坛经》的本子，日本学者还在石川县大乘寺发现宋政和六年（1116）比丘存中刊本的抄本，称大乘寺本《坛经》，铃木大拙在一九四二年出版了此书的核订本，并附录两篇论文和索引。在日本金山天宁寺发现的惠昕本《坛经》写本，也是属于比丘存中刊本。在日本名古屋真福寺还发现了属于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周希古刊本的写本，是惠昕本的早期刊本，石井修道对此作了研究，并发表了校订本。

元代德异本《坛经》。德异在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据由他搜寻到的“古本”刊印此《坛经》，在元宗宝本《坛经》前所载德异之序中对此讲得很清楚。但德异本《坛经》有没有了呢？日本学者黑田亮、宇井伯寿、柳田圣山等经考察研究认为，朝鲜流传的《坛经》属德异本系统。据朝鲜嘉靖年间刻本《坛经》末尾所载高丽僧万恒在元大德四年（1300）写的序，德异刊印《坛经》后，托商人于大德二年（1298）送给万恒一本，托他刻印流行。此后多次印行。此本卷首有德异的序，有记述慧能略传的《略序》，正文分十章，书后有“宋太祖开国之初……至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得五百七十八年矣”的后记。

元宗宝本《坛经》。此为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南海风幡光孝寺宗宝改编的《坛经》。据宗宝的跋文，他是用三本校对，“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全书分十章，附“缘起外纪”、“历朝崇奉事迹”、“赐谥大鉴禅师碑”（柳宗元、刘禹锡）、“佛衣铭”、编者跋文。此为明代以后最流行的《坛经》本子。

《坛经》诸本的发现，为学者进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松本文三郎（1869~1944）是最早研究《坛经》的学者之一，在敦煌本发现之后，于一九三二年写了《六祖坛经的书志学研究》的论文，对明本（即入藏的宗宝本）、敦煌本、兴圣寺本《坛经》作了比较研究，认为敦煌本是唐末《坛经》，但不是最早的《坛经》，也不算是善本，兴圣寺本以此本为基础作了发展，为现存一切本的基础。宇井伯寿（1882~1953）著《坛经考》（载《第二禅宗史研究》），对十几种版本的《坛经》进行考证，认为敦煌本虽不是最早本，但是现存本中最古的，是各本《坛经》的基础。在现存《坛经》中有敦煌本、惠昕

本、德异本和宗宝本三大系统。明洪武本（1373）有朗简的序及契嵩的《坛经赞》，但正文与流通本不同，此或为契嵩本的翻刻。德异所寻的古本，或即为契嵩本，后世一般称为“曹溪原本”。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一九六七年版），对敦煌本《坛经》的作者、形成等作了考察，认为《坛经》是牛头禅派与神会禅派互相影响的结果，内容中的最古部分是无相授戒仪与般若三昧、七佛二十八祖等记述。这些原是牛头禅派之说，编者当为牛头禅派鹤林玄素（668~752）的门徒法海，而到牛头禅遭到禅宗内部批评之时，法海才被说成是慧能的弟子。后来《坛经》中又被增入慧能生平及十大弟子机缘部分。现本敦煌本《坛经》当形成于《曹溪大师别传》（781）与《宝林传》（801）之间。柳田在一九八五年的《语录的历史》中又认为，敦煌本《坛经》最初是师徒间传授的本子，到慧能第三代弟子悟真时又据神会的《坛语》，并吸收《金刚经》，《梵网经》等中的思想，重加以改编。一九八九年柳田在出席于我国台湾召开的国际禅学会议上发表《坛语与坛经》，认为不能设想在敦煌本以前有古本《坛经》存在，《坛经》实是从神会的《坛语》发展而来，“敦煌本《坛经》正是开元初期神会的新佛教运动的记录”；这种新佛教运动重视大乘菩萨戒的传受，受戒者以“自性清净心”为“戒体”，以“般若波罗蜜”为“学处”；《坛经》不仅以神会传戒授法的记录为基础，而且吸收了《历代法宝记》、《曹溪大师传》的内容，可看作是“八世纪禅佛教思想史的成果”。中川孝在《六祖坛经》译注本（《禅的语录》之四）的“解说”中同意胡适的见解，认为《坛经》是神会或其弟子所编，敦煌本《坛经》中有不少地方与神会著作思想及语句一致。

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在一九七八年发表了《慧能研究》一书，其中对《曹溪大师传》及其他的慧能传记资料十八种、《坛经》、《金刚经解义》（传为慧能解义）进行研究，并对《曹溪大师传》用五本校订和训注，对《坛经》五本做了对校。这是日本学者研究慧能和《坛经》的重要成果。

（二）早期禅宗语录的发现和研究

禅宗有一个酝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菩提达摩来华至隋朝的僧璨，可看作是禅宗的酝酿期；至唐朝的道信、弘忍，是禅宗的正式形成期；到慧能、神秀分立南宗、北宗及以后南宗独盛天下，都可以看作是禅宗的发展期。各个时期都有相应的禅宗文献。但在本世纪发现敦煌禅籍之前，禅宗史书典籍几乎全是南宋的，因而对禅宗早期历史的全貌得不到了解。六十年来日本学者从敦煌文书中发现冠以菩提达摩之名的语录及其它早期禅宗文献有多种，推进了对早期禅宗，包括北宗和牛头禅派的研究。

（1）《二入四行论》一卷，在敦煌写本和朝鲜刊《禅门撮要》中都有。铃木大拙《禅思想史第二》将此文分三部分共一〇一段：前十一段为“达摩大师

二入四行论及略序等；”十二至六十七段为“杂录第一”；六十八至一〇一段为“杂录第二”。第一部分前八段，详略不同地见于《续高僧传·达摩传》及《景德传灯录》卷三十所载“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昙林序”及《楞伽师资记》所引的《四行论》。第十一段为《续高僧传》卷十六《僧可传》中的向居士的信。铃木认为前五十六段基本为达摩所述，后来认为第一、二两大部分皆为达摩所说；第三部分为慧可所述。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认为一~八段为达摩弟子所记，第九节以后皆非达摩述，大部分是慧可述。柳田圣山《达摩的语录》认为，这是初期禅宗修持者昙林、慧可、道育、向居士等传承禅法的记录，非一人著述。柳田《语录的历史》认为第一、二部分与《禅门撮要》本一致，皆为昙林所传，与慧可无关；第三部分为达摩，慧可禅系的师徒间的问答。

(2)《达摩禅师论》一卷，日本药师寺所藏敦煌本，关口真大《达摩大师的研究》首次发表（一九五七年）。首部缺，写于唐开耀元年（681），主张“事中徐缓”、“唯净”、“唯善”三种“安乐法门”，虽是后人伪托之作，但对研究早期禅宗很有价值。

(3)《修心要论》一卷，全称《蕲州忍和上导凡趣圣悟解脱宗修心要论》，也称《最上乘论》、《一乘显心论》。虽题弘忍著，实当为弟子集记。敦煌写本有多种，刊本有《禅门撮要》本和安心寺本。铃木大拙《少室逸书》收有校印本，《禅思想史第二》所收是五本的校勘本。此论由十四段问答组成，记载弘忍“东山法门”的禅法主张。

(4)《观心论》一卷，《少室六门》称之为《破相论》，为神秀述。敦煌写本中有多种，刊本有《禅门撮要》本和安心寺本。一九三二年日本神尾弼春著《观心论私考》，据所发现的异本和《一切经音义》所载：“观心论，大通神秀作”，论证此论为神秀撰，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一九三六年铃木大拙发表此论的五本对校本（载于《铃木大拙全集》别卷1），但反对此为神秀著，认为是达摩述，由弟子记录的。此论主张坐禅观心，与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所说神秀北宗“拂尘看净”及《坛经》中批评的北宗“看心看净”的禅法是一致的。

(5)《大乘五方便北宗》一卷，有的写本名《大乘无生方便门》。一般认为是神秀的弟子记述的。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说神秀北宗的禅法是“拂尘看净，方便通经”。此“方便通经”，据此写本是依据《大乘起信论》、《维摩经》、《法华经》、《思益经》、《华严经》发挥所谓“总彰佛体”、“开智慧”、“显不思益”、“明诸法正性”、“了无异”五门，为北宗禅的纲要书之一。主张“看心”、“净心”等。铃木大拙《禅思想史研究第三》收有此论的四本校订本。

(6)《绝观论》，全名《三藏法师菩提达摩绝观论》，被认为是牛头法融著。写本有多种，铃木大拙在一九三五年于北京图书馆发现一种写本（北图八四），

校刊后收入《少室逸书》，题为《观行法无名上士集》，认为是神会禅系的无名法师编集。一九三七年久野芳隆在《宗教研究》上撰文介绍了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三种《绝观论》敦煌写本。此后铃木大拙据此三种写本校写出全文，并在《佛教研究》上撰文介绍。一九四五年铃木大拙与古田绍钦发表了以石井光雄所藏《绝观论》写本为底本，用其他四种本子校订的《绝观论》。在一九七〇年柳田圣山发表了《绝观论的本文研究》（在《禅学研究》五八），介绍了以上五本之外另一种敦煌本《绝观论》，此后发表了用此六本互校的全文。关于《绝观论》的作者，久野芳隆和关口真大据《宗镜录》、《祖堂集》以及《圆觉经大疏钞》中所引的文字，撰文论证是牛头法融（594~657）的著作。柳田圣山在《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认为法融是承达摩《二入四行论》之意而作。铃木大拙在《禅思想史第二》中收有用巴黎本校订的石井本和北京本，但坚持此论为达摩所述。此论显受般若、三论影响，讲“空为道本”，“无念即无心，无心即真道”，讲“绝观”，与法融《心铭》之“绝观忘守”有相通之处。

（三）早期禅宗史书《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 以及《历代法宝记》

过去的中国禅宗史主要讲的是唐末以后的南宗史，所据资料也多是南宗的人编撰的。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传法宝纪》、《楞伽师资记》以及《历代法宝记》，提供了研究禅宗初创期和禅宗北宗、其他禅派的最新资料。

（1）《楞伽师资记》一卷，唐净觉撰。写本有多种，皆不完整。著者净觉（683~750）是唐中宗时韦后的族弟，从他所著《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载李知非之序、王维《净觉师碑铭》，可知其生平。此书当撰于唐开元四年（716）之前。胡适最早从敦煌遗书中发现此书三种钞本，交朝鲜学者金久经校订，后在金久经编的《菴园丛书》（一九三四年）中发表。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一九三〇年发现的一种写本（斯坦因二〇五四），收在《鸣沙余韵》中影印介绍，后《大正藏》卷八十五所收本是以此本为底本，以金氏本校之的。此后关于此书的写本续有发现。一九五四年筱原寿雄在《内野台岭先生追悼论文集》中发表了《楞伽师资记校注》，是将《大正藏》本与金氏本重加校对的结果，又加注文，但仍缺卷首。一九六六年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书后所附资料中，吸收以往成果，又利用田中良昭新的发现，发表了新校订的《楞伽师资记序》，卷首补上所缺部分（从文义看，仍不全）。此序与以往学者所校正文合并，是一部迄今最全的《楞伽师资记》了。此书为传授《楞伽经》为禅法宗旨的祖师立传：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和神秀、玄奘、慧安以及普寂、敬贤、义福、惠福，共八代十三人，各传详略不同。对他们的生平、禅法思想作了介绍。其中“道信章”最长，主要引其所著《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在弘忍、神秀二章，主要引用玄奘《楞伽人法志》

(约撰于七〇七年以后，记弘忍及弟子神秀、慧安的楞伽禅系传)。本书不重视法如和慧能，仅把他们列于传教于一方的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中。

(2)《传法宝纪》一卷，唐杜朏撰。矢吹庆辉《鸣沙余韵》(一九三〇年)及《解说》(一九三三年)中最早收有一种敦煌写本(伯希和二六三四)，缺后部的三分之一。此后神田喜一郎又发现一个写本(伯希和三八五八)，校订后在白石虎月《续禅宗编年史》附录中发表，此仍缺后面神秀的塔文。一九六〇年柳田圣山在友人的帮助下得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最完备的写本(伯希和三五五九)的照片，校订后发表在他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所附资料中，一九七一年将此书与《楞伽师资记》排印并译为日文，题为《初期的禅史Ⅰ》(《禅的语录》2)出版。《传法宝纪》的作者“京兆杜朏字方明”，可能是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全唐文》卷二八〇)中的“朏法师”，住大福先寺，义福从他学过大乘经论。日本学者多认为此书撰于开元初年(713)，实际上当撰于开元四年至开元二十年(716~732)之间。书中记述相传为禅宗七祖：菩提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法如、神秀的略传及禅法主张。此书承《法如禅师行状》的祖统说，所谓达摩“绍隆此宗”，“入魏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忍传如”，也以法如为第六祖，以神秀上承法如。此书明记从达摩至僧璨以《楞伽经》相传授，并在达摩传中批评“壁观及四行”。

(3)《历代法宝记》一卷。敦煌写本中有完整的本子，《大正藏》卷五十一所收的是以斯坦因五一六写本为底本，与伯希和二一二五对校的本子。此后矢吹庆辉《鸣沙余韵》及《解说》中收有此写本的影印本及介绍文章。一九三五年金久经又重校，收入《董园丛书》中。此后又有多种写本发现，为校订此书提供了新的资料。一九七六年柳田圣山在《初期的禅史Ⅱ》(《禅的语录》3)发表他校订与日译的《历代法宝记》，并加详细解说。此书是唐代成都保唐寺无住(714~774)死后不久由他的弟子编撰的，宣传以保唐寺为中心的禅法为正统的禅宗史书。保唐禅派是相对于南、北二宗的另一禅系，因肃代二宗时的宰相杜鸿渐(709~769)曾从无住受法，故此派在今四川一带曾盛行一时。此书记禅宗二十九代祖相传世系，但把二十九祖菩提达摩称为菩提达摩多罗。利用神会的祖传法衣之说，编造此衣在则天武后时被诏送朝廷，后转授于智洗，经处寂、无相，传于无住，以此证明保唐禅派的正统性。无住的禅法以强调“无忆、无念、莫妄”为特色，说“一切众生，本来清净”……与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所说无住“但贵无心为妙极”、“灭识”是一致的。

(四) 神会语录

弘忍死后，以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等人为代表的禅宗北宗，在以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十分盛行。慧能的弟子神会(670~762)代表南宗出来与北宗辩论、抗争，使南宗影响日益扩大，安史之乱后在朝廷支持下南宗

被确立为禅门正统。长期以来，神会的语录等文献在社会上佚失，仅靠宗密的著作等，了解其部分情况。一九二六年胡适最早发现敦煌遗书中的神会遗著，校订出版《神会和尚遗集》（详后）。日本学者对此十分重视，也发现了神会的遗著。石井光雄购入的敦煌写本中有一部神会语录，与胡适发现的《神会语录》有很多不同。一九三二年石井光雄将此件影印出版，题为《敦煌出土神会录》，附铃木大拙所著《敦煌出土神会录解说》的小册子。一九三四年铃木与公田连太郎重加校订，题为《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并加上《解说及目次》，由森江书店出版。此录篇幅比胡适发现的《语录》略大，尾部有从达摩至慧能的六代相承略传及《大乘顿教颂并序》，最后题记中有“唐贞元八年岁在未，沙门宝珍共判官赵看琳于北庭奉张大夫处分，令勘讫。其年冬十月廿二日记”。此语录的原题当为《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为唐刘澄集记。胡适晚年所校的一个抄本就有题为“唐山主簿刘澄”写的序，有此书名。

以敦煌禅籍研究为重点的研究著作有很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这样一些：（1）铃木大拙《敦煌出土少室逸书》、《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禅思想史研究第二》、《禅思想史研究第三》，是铃木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对所发现的早期禅宗文献所作的校订、研究，对早期禅宗历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2）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一九三九年），对菩提达摩及其弟子、牛头禅派、弘忍法嗣及北宗禅、神会、马祖与石头等禅系禅法，有详细论证，把传统的佛教史传资料，新发现的《祖堂集》、《宝林传》及碑铭资料、敦煌资料融为一体使用，别具特色。书后附有“北宗残简”，收有敦煌禅籍和传统史料多种。在一九四二年宇井又出版了《第二禅宗史研究》，其中的《坛经考》详细地介绍了诸本《坛经》的特色，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考证。此外几篇对南宗慧能及其弟子、南岳和青原两大法系、牛头禅派等作了论证。（3）关口真大《达摩大师的研究》（一九五七年），对多种冠以达摩之名的资料，如敦煌本《绝观论》、《无心论》、《观心论》、《证心论》、《四行论》等作论证，对在日本发现的《达摩禅师论》作了重点论证。认为许多“达摩论”是后人伪托达摩之名而造的，如《观心论》为神秀撰，《绝观论》和《无心论》为牛头法融撰，等等。（4）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一九六七年），前面多次提到，此书对早期禅宗史书的多种资料及禅宗史上的重大问题，都有论证。对敦煌禅籍中北宗系的《传法宝纪》和《楞伽师资记》、南宗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以及《六祖坛经》、《曹溪大师别传》、四川保唐禅派的《历代法宝记》、《宝林传》作了详细探讨论证。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见解，对以往国内外的有关研究作了概要介绍和评论。注释详尽，为了解本世纪早期禅籍的研究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一九八五年发表《语录的历史》，详细考察了从达摩《二入四行论》到《神会录》、《坛经》及以后诸禅祖语录形成发展的历史，其中对敦煌禅籍的分析论述占有很大篇幅。（5）笈原寿雄和田中良昭编的《敦煌佛典和禅》（一九八〇年），是一部由十二人集体分门撰写的著作，对敦煌禅宗文献的内容

及其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论述。(6) 田中良昭在一九八三年出版了《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是他二十年来从事敦煌禅籍研究成果的集编，对禅宗史书《楞伽师资记》等，对《二入四行论》等禅法文献，对各种文体的文献等作了细密的考察，还对《禅源诸詮集都序》的敦煌本残卷作了研究。

日本筑摩书房从一九六九年以来组织学者编写《禅的语录》，全二十卷。对中国禅宗的代表著作进行译注，各书包括新校订的原文、日本训读、现代日语译文、注释和解说。“解说”部分介绍各书的原作者、编写的时代背景、书的内容和特色、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及各种版本等。现已出十七册：《达摩的语录》、《初期的禅史Ⅰ》（《楞伽师资记》、《传法宝记》）、《初期的禅史Ⅱ》、《历代法宝记》、《六祖坛经》、《顿悟要门》、《庞居士语录》、《传心法要·宛陵集》、《禅源诸詮集都序》、《临济录》、《赵州录》、《寒山诗》、《辅教篇》、《雪窦颂古》、《十牛图等（四部录）》、《大慧书》、《无门关》、《禅关策进》，其他待出的有《神会语录》、《洞山录》、《语录的历史》（已在《东方学报》第五十七册发表）。

近代以来，从中国、朝鲜、日本发现一些珍贵禅宗资料。柳田圣山主编的《禅学丛书》影印一批上述禅宗典籍（古版或抄本）全书拟出十二册，已出十册。题目是：《宋本古尊宿语要》、《禅门撮要·禅源诸詮集都序·法集别行录节要》（高丽本）、《四家语录·五家语录》、《祖堂集》、《宝林传》、《传灯玉英集》（《宋藏遗珍》本）、《景德传灯录》（宋版与高丽本）、《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敕修百丈清规左觚·庸峭余录》、《临济录抄书集成》、《禅林象器笺·葛藤语笺》。其中《祖堂集》是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0）由雪峰下第四代静、筠二禅僧编，是中国最早的禅宗南宗记言体史书，在宋初《景德传灯录》流行后失传。此为《高丽藏》再雕本的附录所收刻本。《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收有《坛经》的敦煌本、兴圣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大乘寺本、高丽本、明版南藏本、明版正统本、清代真朴重刻本、曹溪原本、流行本、金陵刻经处本，对研究唐代禅宗和《坛经》的演变很有参考价值。

在禅宗史研究方面，近年出版了阿部肇一的《中国禅宗史的研究》，论述禅宗从唐至宋的发展过程，在对禅宗史实的考察中密切结合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铃木哲雄的《唐五代的禅宗》，著重考察南宗青原、南岳两系禅派势力在以湖南、江西为中心的地区的发展，利用广博的史书和碑文资料，论证各禅派的特色。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的研究》，对《景德传灯录》的内容结构和特色，对作者道原作了考察；重点探讨了曹洞宗的形成和发展，对以宏智正觉为代表的默照禅作了详细论证；还考察了日本道元创立的日本曹洞宗与默照禅风的异同，认为道元的禅法是对中国曹洞宗默照禅的发展和“超越”。

在禅宗辞书方面，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禅学大辞典》最有名。这是日本曹洞宗的驹泽大学禅学大辞典编纂所组织近五十名学者用了二十六年时间编成的，共有三卷，收语汇三万二千个，包括印、中、朝、日禅学和禅宗历史、思

想、人物、著述等方面的术语、名词等，还附有禅宗史迹地图、禅宗法系、年表、禅籍分类要览等。

中国学术界在六十年来社会经常发生变动的环境中，禅宗研究也是取得了成绩的。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胡适（1891～1962）。胡适在一九二四年试写《中国禅学史》稿，写到神会时，仅从《宋高僧传》和宗密的论禅宗的著作中找到很少材料，感到很难写下去，便决心搜求关于神会的史料。一九二六年因事出访欧洲，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检阅敦煌写本，发现三种神会的语录和神会的《显宗记》，回国后加以校订抄写，一九三〇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题为《唐神会和尚遗集》。上述三种神会的语录，一是《神会语录》，实即《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的残卷，与日本石井本《神会语录》大体上相同；另两种实际是《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的两部分残卷。胡适在卷首写了《荷泽大师神会传》，对神会继承慧能，与北宗辩论，宣传南宗禅法，以及神会的禅法主张、南宗正统地位的确立等，作了详细的论证。胡适在文章中考证，《六祖坛经》的重要部分是神会作的；“如果不是神会作的，便是神会的弟子采取他的语录里的材料作成的”。在文章结尾，对神会作了很高的评价：“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神会研究，胡适是开创者，立即在日本引起反响。铃木大拙在此后校订了石井本《神会语录》和北京图书馆本《坛语》。胡适晚年继续研究禅宗。一九五八年他据新发现的敦煌写本校订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九六〇年又据新发现的敦煌写本校出《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残卷），都写了论文。这些校本和论文在胡适去世后都被收到新版《胡适校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集》（一九六八年台湾胡适纪念馆版）附编之中。胡适对早期禅宗、《坛经》也写过几篇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在佛教研究方面，在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学者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研究佛教的历史、理论和教派。在禅宗研究中，总的说来开展得还很不够，特别是利用新资料的研究较少。比较有影响的论文有任继愈的《禅宗哲学思想略论》（载任著一九六三年人民出版社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本文扼要地介绍了禅宗的形成发展的过程、早期禅宗流派；认为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论述了慧能禅法理论中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主张；明确地指出禅宗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性质，说：“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起过某些进步作用，并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但不能忘记它首先是宗教，其次才是哲学。这种哲学是深刻的，但是头脑颠倒的。”

吕澂（1896～1989）多年从事佛教研究，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都作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一九五四年在《现代佛学》上发表了《禅宗》一文。此后，一九六一年受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托，举办了佛学研修班，向学

员系统地讲授印度和中国的佛学源流，其《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在一九七九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的第七讲“楞伽师与达磨禅”和第九讲“南北宗禅学的流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禅宗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论述中利用了敦煌部分禅籍和其他新史料，提出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见解，例如：认为从达磨、慧可后，以《楞伽经》为禅法依据，“修头陀行，遵守一种严格的戒律”，而到唐代道信、弘忍之时出现许多变化，他们在黄梅聚徒教禅，传戒，除重《楞伽经》之外，还吸收《法华》、《般若》等经的思想，说“念心”即是“念佛”；现存《最上乘论》主张守自心，心即“心真如门”，说此书是弘忍所作也是有根据的；北宗神秀的禅法主张，应主要从《楞伽师资记》中得到了解，所传由他著的《观心论》，不甚可靠；敦煌文书中的《大乘无生方便门》或《大乘五方便》，揭示了宗密《圆觉经大疏钞》中所说神秀的禅法是“拂尘看净，方便通经”的具体内容；《六祖坛经》为后人几经改变，其中“哪些是慧能的思想，哪些是后人的，已很难一一区别出来了，至于现行的本子是否就是神会一系所改动的，这也很难确定”；“敦煌本《坛经》，由字迹上断定是五代时写的”；研究慧能的思想并不能以《坛经》作为唯一的根据，现仍宜以王维的《能禅师碑铭》作依据；神会思想出于慧能，对北宗批评的两大纲领是：“传承是傍，法门是渐”，强调“无念为宗”。此外，对唐末五代由南宗青原、南岳之下分裂成禅门五家，及它们的禅法特点；宋代以后禅教渐趋一致，禅学又与玄学结合，禅法流派之迭兴，如“文字禅”、“看话禅”、“默照禅”等，都有简要而精辟的介绍。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佛教研究取得很多成绩。在禅宗研究方面，除有研究论文、专著外，还注释出版了若干禅宗文献。一九八〇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了郭朋的《隋唐佛教》，其中第四章第四节“中国佛教的特产——禅宗”，着重论述了禅宗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史。除《坛经》主要用敦煌本外，其他多用传统史料。作者认为，《坛经》敦煌本是慧能弟子“法海当时的记录本”，比较真实，此外还有“唐僧惠昕的改编本”，曹溪原本（有明代成化年间重刻本）、元宗宝改编本；其中的曹溪原本，“就是契嵩的改编本”；作者又对四本《坛经》作了一些对比，指出后出的《坛经》作了很多篡改，“特别是曹溪原本，其实它远非原本，而是比惠昕本还要晚出，成了宗宝改编《坛经》的蓝本。而宗宝本《坛经》，由于文字比较通畅，内容上后期禅宗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因而它几乎成了《坛经》唯一的流通本”。在对慧能思想的评述中，作者反复强调慧能的世界观是“客观唯心论”，而不是“主观唯心论者”。“因为，慧能在这里所表达的，完全是真如缘起论思想。慧能认为，性本清淨的真如法性，由于为妄念浮云所盖覆，便随缘而生起包括主、客观世界在内的一切万法。这是标准的真如缘起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在对慧能以后的禅宗，对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及它们的禅风，作了概要介绍。此后，郭朋把敦煌本、契嵩本（认为即曹溪原本）、宗宝本分段对勘，在每一段

落后加按语，说明三本的异同，并作简要评述。此书题为《坛经对勘》，一九八一年由齐鲁书社出版。郭朋还以日本铃木大拙、公田连太郎所校敦煌本《坛经》为底本，加以校订和注释，以《坛经校释》的书名，一九八三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为国内第一次校释和出版敦煌本《坛经》，为研究禅宗提供了方便。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苏渊雷点校的《五灯会元》。近年来国内研究《坛经》和慧能的思想，研究唐宋禅宗人物、思想和历史的论文，发表了不少。也出版了一些比较通俗地介绍禅宗思想、禅宗和中国文化的读物。

在海峡彼岸，台湾地区的学者在禅宗研究中，除胡适外，也有其他学者做出重要成绩。印顺的《中国禅宗史》（一九七一年广益书局初版）是一部有分量的专著。此书广博地利用传统的禅宗史料和本世纪以来新发现的史料，并吸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着重探讨从印度禅演化为中华禅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禅史应包含两大部分：禅者的事迹与传承、禅法的方便施化与演变。禅宗重视师承，甚至编造祖统，但此实际与禅法传承无关，即使达摩以来禅师的传记，其中也有很多传说成分。禅法虽非语言文字所可表述，但作为引导的方便来说，形成不同时代、地区和流派的禅风，由此可看出禅在发展中的历史事实。作者还认为，从达摩“理入”的体悟同一“真性”，到慧能的“自性”，南方宗旨的“性在作用”，达摩门下是一贯的“如来（藏）禅”。中国禅的完成在会昌年间之后，“达摩禅的中国化，主要是老庄化、玄学化”。慧能的“无住”简易禅法，为达摩禅的中国化开辟了通路，而完成这一倾向的，是洪州马祖，特别是石头希迁门下，其标志是“通过了，融摄了牛头禅学”。本书对慧能以前的禅宗，对北宗、牛头宗都用相当大篇幅作论述；对《坛经》的成立与演变、对曹溪南宗的传播与成为禅宗主流，作了详细考察、论证。作者坚持《坛经》是慧能所说，法海集记，但它以后有发展，批评了以为《坛经》是神会或其门下所作，以及认为是牛头宗慧忠所作等说法。在台湾，近年来影印出版了不少禅宗资料汇编，著名的有选自《卮字续藏经》的《禅宗集成》二十五册（艺文印书馆版），还有蓝吉富主编的《禅宗全书》百册（文殊出版社版）。后者几乎收罗了迄今发现的一切禅宗文献，既包括传统资料，也包括敦煌禅籍、碑刻资料等，在正文前都有概要的“解题”。

总之，从忽滑谷快天出版《禅学思想史》至今，中日两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也取得了飞跃的进步，禅宗研究已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禅学思想史》有无意义呢？历史不能中断，学术研究史也不能中断。此书尽管由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对早期禅宗没有深入探究，在很多方面也没有展开论证，但它对印度与中国禅学的介绍；对南宗禅的发展；对唐以后不同时代和各个禅派人物、禅法、著作的介绍和评述，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此书对广博资料的引证，也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可节省检索原著的时间。当然，今后学术界还应有计划地翻译一些日本较新的禅宗研究著作。可喜的是近年我国已翻译出版了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

柳田圣山《禅与中国》等，在一些刊物上也译介了日本学者部分禅宗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在中国禅宗历史、敦煌禅籍和其他文献资料的研究、整理中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相信随着翻译出版日本和其他国家学者禅宗著作的增多，一定会对中国禅宗研究产生积极促进的作用。

最后，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朱谦之教授所译《中国禅学思想史》，表示我的敬佩和感谢之情，相信朱谦之教授在天之灵看到此书终于出版也会感到欣慰的。本文中一定有不少疏漏和欠当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于北京东环北路寓所